



# IPER

|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系列

IPER 政经观察 第 1518 号

2015 年 11 月 10 日

冯维江

fwjack@163.com

## 以大事小的操作指南\*

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三十多年，我们的对外合作的取向可归纳“以小事大”，即注重搞好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大国的关系。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我们的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又说有的人理解就是对西方发达国家这一个方面开放。小平同志从大格局的思路批评了这种片面的看法。眼里只有西方自然有一叶障目之虞。不过小平同志也把西方列在三个方面的第一位。他说“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代表中国参加复关和入世谈判的龙永图先生说得更加直接，“中美关系好了，一好百好”。从相对弱势一方来看，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这段时间，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是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来源，也是中国商品的主要市场。所谓“两头在外”，实则“两头在西”，容不得中国不韬光养晦、以小事大，努力释放善意，竭力维护好中美关系。

中国在错失近代工业化、电气化的列车以后，终于搭乘上了全球化的快车。现在，以每年创造的经济价值总量来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虽然从人均水平看，中国与美西方还有较大差距，但从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商品、市场、投资乃至货币的不对称依赖状态来看，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而为大国的特征日趋明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期待或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

但是，与三十多年积累的以小事大的经验相比，我们对如何以大事小已经有些陌生。一方面，中国希望能扮演更积极和建设性的角色，为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中国也担心落入“国际责任陷阱”，被迫承担了超出

---

\* 本文已发表于《当代金融家》2015 年第 8 期。



中国国家能力的责任，造成国力的过度损耗。如何处理正确地以大事小，成为中国亟需掌握的“技术活儿”。

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历史上的中国的确是拥有悠久的“事小”经验的，也早已发展出了比较丰富的工具箱。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更有必要重温“以大事小”的操作技术。

## 魅力型以大事小：主持公道

商朝末期，周文王（那个时候还叫西伯侯姬昌）的时候，虞国和芮国因为交界处的一块领土的归属发生了纷争。双方决定去西岐找姬昌说理，请他来为争议领土的归属做裁决。两国国君结伴而行，进入周的国境后，发现所遇到的国人的面貌焕然一新。耕田的人相互礼让，田块与田块之间留足了田埂；在狭窄的道路上相遇，人们总是互相谦让。进入周的都城，看到城内秩序井然，男人与女人分别在不同的道路上行走，头发斑白的老人也生活安逸、不需要扶助，不同级别的官员举止得体、相互执以与其身份地位相匹配的礼仪。虞芮两国的国君见了周国的情况非常惭愧，反省说“我们真是小人，不配踏入君子的朝廷”。于是连仲裁人姬昌也没见就离开了周境。原本相互争夺的那块土地，也成为双方都不占用的缓冲区。

虞芮两国在出现纷争的时候能够首先想到请姬昌主持公道，这是因为姬昌已经在各国之间形成了处事方正持平的声誉。这种通过主持公道的方式来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对提供者来说直接的成本微乎其微，但在取得国际认同、获得国际权力方面的收益非常大。从实际效果来看，姬昌长期积累的声誉，为后来周武王伐纣时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奠定了基础。

魅力型以大事小，对大国本身的条件具有较高的要求。首先，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要比别的国家更高，能让别的国家羡慕。其次，这个国家要长期坚持一种公正可靠的态度，从而不断积累其他国家对它的信任。第三，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要具备较高的权威，调解的结果能够被涉事各方，以及其他“观众”国家认可。



第四，这个国家还要秉持一种非孤立主义的态度，愿意为国际事务承担责任。

尽管调解纠纷本身的直接成本并不大，但要具备前述条件所需的资源积累与相关投入却非常巨大。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而言，魅力型以大事小可能是中国长期努力的目标，但还远非现实。中国并不具备上述严苛的条件。虽尚未至，心向往之。中国在国际社会一贯坚持公道的立场，已经为之赢得了“彼此之间可能是相互对立的各方都以中国为友邦”的局面。这为未来“魅力攻势”的展开奠定了良好但尚显微薄的基础。

### 强制型以大事小：收取质子

周朝到周平王的时候，天子被蛮夷打得迁了都，颜面与权威双双扫地，再也无力控制诸侯国。周平王为了平息在朝廷为卿士的郑庄公的不满，竟然将太子姬狐送到郑国充当人质（同时郑庄公也以公子忽遣周作人质，总算给天家留下一点颜面）。向来只有中央朝廷向地方诸侯索要质子、以便控制后者，现在天子竟然以太子为质以取得臣下的信任。这是强弱异位，大小颠倒的结果。

大国向小国收取质子，是为了增加强制的力量与手段，迫使小国输诚。小国派遣质子，则相当于提供了一种争取信任的保证金，“将自身利益攸关之事，置于大国背信弃义的风险之中”，展现了一种对大国的实质上的信任（尽管主观上小国未必高兴）。

质子是大国与小国信任度不够时，保证合作能够继续开展的一种有效的办法。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意识形态、价值观与美国完全不同，中国人从来也不讳言这一点，但中国的发展没有遭受到来自美国的重大阻碍，甚至在技术、管理、市场等方面还与美国有良好的合作并受益于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向美国输送了“质子”。其一是英语。大规模启动英语教育和在全社会普及英语，让美国人相信中国拥抱英语世界的决心。其二是美元储备。中国将辛苦生产和出口换回的美元绝大多数换成美元资产回流美国，这些储备成为掌控在美国手中的重要“质子”，使美国更加相信中国对其所掌控的国际体系并无颠覆之意。



某些次区域的信任不足同样可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障碍，此时让当事国向国际社会做出必要的可置信的承诺，也是应有之义。否则没有人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向这些地方投资，这其实也不符合当地人民的利益。虽然看似受到了强制，实则“捆绑双手却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曾反复阐释的道理。

### 羁縻型以大事小：送女和亲

汉初高祖率兵亲征匈奴，被围困在白登山。手下谋士陈平献计说动单于夫人（阏氏）向单于吹枕头风，放走了汉高祖。一种说法是陈平派人送了一名美女给阏氏说，我们汉地的漂亮姑娘非常多，如果您不劝说单于放了我主，我便派人给单于送去多多的小姑娘，这样阏氏您的地位可就不保了。如果传言可信，阏氏可算是被陈平这厮坑得好苦。高祖回国后，很快接受了谋士娄敬的意见，把宗室女子送给单于和亲。娄敬是这么劝说的：皇帝把女儿送给单于做夫人，您就是单于的岳父，说不定以后的小单于就是您的外孙。天下哪有女婿打丈人、外孙打姥爷的道理。客观的说，和亲政策的效果不错。汉武帝重击匈奴之后，后者不再敢以要挟的方式，而是以恳求的方式来寻求和亲。

和亲是一种羁縻小国的方式。和亲时往往带去大量的铁器、书籍、茶叶乃至工匠等。通过和亲的公主还可以获取小国的情报，影响小国的政策、行为、生活方式乃至治理模式。通过和亲，让小国不对大国产生敌意，并且在许多方面产生更深的不对称依赖。

羁縻型以大事小的大国一般也具备一些特征。首先，大国的文明程度比小国更高，对小国有一定的吸引力。其次，大国的力量尚不足以让后者产生畏惧，不能以强制力来让后者屈服，或者说强制的方式对大国来说太“昂贵”。第三，羁縻的方式能够对小国产生影响，让其对通行的规则、制度产生一定的认同，对大国的管理模式、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学习或模仿的欲望。

作为原型的和亲在现代社会早已不合时宜，但其背后的精神实质仍可经创造



性转换，发挥重要的作用。现代化的羈縻型以大事小，其核心即技术援助。也即向小国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智力、技能、咨询、资料、工艺和培训等方面提供资助等各项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改善小国的治理水平，提升其对大国的亲善程度。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这种方式有望得到比较广泛的运用。

### 收买型以大事小：厚往薄来

明成祖篡位之初，为了彰显自己的合法性，急着向海外派出招贡团（在各国看来其实就是招商团），招徕各国前来朝贡，登基之后曾经在3个月内向南洋等地派了8次。对朝贡的国家，明成祖非常慷慨。不仅豁免税收，给予多倍的价值补偿，还对国王回赐丰厚的礼物。以至朝鲜国王看到礼物之后大惊失色，询问使者，“皇帝何以厚我至此极也？”在成祖重赏招徕之下，出现番王来朝的盛况，东南亚四国国王联袂朝见天朝皇帝。但超值购买的事情，好比公司搞“促销”，短期内可以做做，起到博取“眼球”的效应。但长期这么“烧钱”，就缺乏财政可持续性了。后来明朝成祖一系的合法性已经底定，在朝贡贸易上也就逐渐回归定贡期、定贡道、定贡物的制度化轨道上，虽然还是厚往薄来，但力度有所缩小，不至于让天朝府库捉襟见肘。

厚往薄来是一种收买型的以大事小。通过利益让渡来换取小国的支持。但这种关系比较脆弱，一旦厚薄有变，反倒容易引起怨怼。明朝削减对日本的回赐及朝贡贸易的对价之后，日本人先是赖着不肯走，说这样回去肯定会被上司砍头，继而甚至以放任倭寇相威胁。

上升期的国家容易采取收买型的策略来急于证明自己。为了把“新灶”催“热”，一开始撒一点钱也无可厚非。但有两个前提，一是要量力而为，不能“不计成本”。二是最终要达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效果，不能一直是自己在哪里烧冷灶，别的国家则袖手旁观。

以大事小的具体形式很多，并非简单的“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可一言尽道之（即便是仁，也有君子之仁、妇人之仁等种种）。也不可机械地照搬某一种以



大事小的方式来处理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只能是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综合择取某些方式的长处、避免或减少其短处来应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IPER 系列简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系列（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PER）包括政经观察和工作论文两个子系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组织和发布。

**责任条款：**本报告仅供内部讨论。报告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本报告仅代表研究人员个人看法，并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的观点。